

王 好 立

从“夷”到“洋”

——近代中国人眼中的世界

- 20 世纪以前中国人的“天下观”：
中国居天下正中，中国占天下十之八九；
- 汉唐盛世，中国人的西行足迹未出亚洲；明初郑和七下西洋，可惜昙花一现；
- 古人曾经认为西方世界“地生差别”，种种错误信息世代相传，历经千年得不到纠正；
-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万国全图》遭到明朝和清朝的士大夫严厉批判；
- 本世纪初期，西方的戏剧叫做“文明戏”，洋人的手杖叫做“文明棍”，似乎中国的事物已经与文明无缘。

中华民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古代中国人关于地理的知识，关于山脉、河流、地形、土壤、植被、气候等方面的丰富知识，是这一文明的重要内容。但是，对于人类居住的这个地球，对于整个世界，古代中国人的认识却显得惊人的苍白和贫乏。这同高度的文明形成落差。直到 19 世纪中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只有一种“天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观念。

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同“中国”或“九州”的观念相差无几。“中国”一语，初指“京师”或“京都”，即国之中心；后来是指“中州”或“中原”，即华夏族聚居之地，也即现今的河南一带。随着汉族活动领域的扩大，又指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同中原王朝的版图逐步接近。“中国”作为专用称谓，特指国家的全部领土（包括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是 19 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九州”的观念，大约酝酿于战国时期，成形于秦汉之际。它的范围，大体不出华夏民族和邻近民族的活动区域。“九州”之中，各州的名称、划分和位置，在不同的著述中多有差异，因为它不是真正的行政区划，而是笼统的地理区分。“九州”之说，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划分政区的框架和构想。因此，“九州”成为统一的中国的代称。

“天下”的观念虽然出现较早，大约也是在秦汉之际才有比较确定的内容。狭义的“天下”，即指“中国”或“九州”；广义的“天下”，则兼容域外或海外的“蛮夷”之国。广义的“天下”由两大支柱所支撑。其一，中国乃中央之国，居天下正中，蛮夷之国居于四边。其二，中国乃泱泱大国，占天下十之八九，蛮夷小邦仅占十之一二。这就是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观念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末年来华时，他所见到的职责图和海图就是这种

观念的体现 中国的 15 个行省居图之中，四周零星分布若干岛国，合计所有岛国的疆土，还不及中国的一个小省。这种地图的形制作为官方舆图的主流，源远流长。直到 20 世纪初期，这种地图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战国时期曾经有一种“大九州”说。根据这种学说，中国之内的九州不得计算为州，中国只是天下八十一州之中的一州，名曰“赤县神州”。天下八十一州的每九个州合为一大州，各有小海环绕，互不相通，是为“大九州”。九个“大九州”之外另有大海环绕，是为“天下”。这种天下观念极富想象力，不过它毕竟是一种虚幻的演绎，无法征信。它的创始人邹衍是齐国人。齐地滨海，“大九州”说确实透出海洋文化的气息。或许因为如此，它才始终偏离中国人地理观念的重心，只能为神话和志怪所纠缠。

其实，中国人广义的“天下”观念只是古代东亚文明的历史写照。把自己的活动空间看作整个的世界，这是上古民族的普遍的特征。只是中国人保持这种特征过于执著，从上古越过漫长的中古，一直迈向近代的门槛，始终无怨无悔。而希腊人早在公元前 5 世纪，就以欧洲、亚洲和利比亚洲（非洲）作为世界地理的分区，在公元前 3 世纪，就相当精确地计算出地球的大小。

东亚大陆背山面海、土地辽阔，为中国文明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足够宽广、足够多样、足够安全的地理环境，使中国文化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之中一枝独秀，绵延数千年而未断绝。然而这个地理环境，也塑造了传统中国文明相对内向和保守的性格，限制了中国人探索世界的脚步和目光。

据史籍记载，最早向西方“探险”的中国人是西汉的使节张骞。张骞负有远交近攻的外交使命，所以被匈奴国王扣留多年，“身所至者”出新疆西部不远，安息（波斯）、条支（阿拉伯）等

国只是有所耳闻。东汉班超远征西域，派遣部属甘英前往大秦（罗马）甘英抵达“安息西界”，为大海阻断去路，未能完成使命。按照汉代官方史书的记述，大秦“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差不多同邈远的神话传说融会在一起了。唐代的杜环大约是最早到达亚洲西部边境的中国人，不过他是作为战俘，被大食（阿拉伯）人带往中亚和西亚的，他的见闻没有产生影响。唐代高僧玄奘和义净，分别经陆路和海路远赴印度取经，堪称壮举，只是足迹不出亚洲的南部。

在气象恢宏的汉唐盛世，中国一直没有人能走出亚洲去看世界。元代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推进了东方和西方的交通。然而元代远行者的西行记录，尚不及甘英和杜环，未能进一步开拓中国人的眼界。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浩浩荡荡的中国船队远达非洲的东岸，可惜昙花一现，空前而绝后，仍然没有形成长期的影响。

从汉代至清代中期，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商人、使节、传教士访问中国，络绎不绝。元代来华的马可·波罗就是杰出的代表。他们把世界东方的信息传到西方，不断修正和充实有关中国的知识。中国人则是坐以待客，对于世界西方的知识只能得诸口传和耳闻，含混和错误的信息可以世代相传，经历千年而得不到纠正。所谓“地生羊”的故事就是典型事例。公元9世纪，关于拂林国（东罗马帝国）有地生羊，“脐与地连，割之则死”的传说写入唐代的笔记小说。10世纪，《旧唐书》以文入史，将其写入《拂林传》。11世纪，北宋修《新唐书》，照收不误。16世纪，著名学者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也将这种既非动物也非植物的乌有之物列入他的科学著作。18世纪，清代的百科全书《渊鉴类函》仍将其收录在案。即使在19世纪，多数士大夫和老百姓也不

曾对“地生羊”这个怪物发生怀疑。

“地生羊”的故事反映出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的无知，同时也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东方的智慧”。中国人对于域外异闻，绝不十分认真，也绝不存有强烈的好奇心理，这或许淡化了很多“地生羊”一类的荒唐认识。不过，这种对于未知世界的冷漠态度，比对于它的错误认识距离真理更远。欧洲人 15 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开辟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崭新天地，逐步勾画出地球的真实面貌。中国人则抱着古老的“天下”观念，不知道天外有天。

明代末年，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图》、《坤舆万国全图》先后在中国刊刻。士大夫们第一次知道地球上五大洲和三大洋，有热带、温带和寒带，中文里面第一次出现亚细亚、欧罗巴、亚墨利加、地中海、大西洋等词语。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出版了他编写的《职方外纪》，第一次用中文著述向中国人介绍有关世界的知识。但是，只有少数官员真心接受了这些新鲜的知识。多数士大夫不是以消闲赏玩的态度，就是以顽固拒斥的态度对待它们。这个地理知识的启蒙时期未能维持多久就遭到全面清算。明末的《圣朝破邪集》有一篇批判文章，抨击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中国土地广大，而图中‘如此蕞尔’”；“其肆谈无忌若此”。到 18 世纪后期，《大清文献通考》犹谓利玛窦“所称五大洲之说，语涉诞诞”。同一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对艾儒略介绍的世界知识表示怀疑，以为“多奇异，不可究诘”。不过编撰者的态度相当宽容，只是说“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

在当时的世界，真正“广异闻”的主要手段只能是亲身游历、实地考察，但是“安土重迁”的社会意识在中国根深蒂固，它与“闭关锁国”的政策一脉相通，因此很少有人能够身体力行。少数

先进的中国人曾经尝试冲破这种社会意识和政策的樊篱，可是大多没有结果。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徐霞客，对于中国旅行家的行迹“多囿于中国一隅”感慨不已。他梦想“为昆仑海外之游”探索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广大世界，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中国的官绅和百姓以“九州”为“天下”的观念迟迟不能更新，而世界却迅速地发生着变化。19世纪中叶，英国人用兵舰把这种变化送到中国深闭固拒的大门跟前。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大清帝国对于它的对手英吉利国几乎一无所知，道光皇帝匆忙下令查明英国情形。据琦善“访知”，英国乃女王主政，而且女王“自行择配”；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臣上下”。耆英奏称，英人夜间目光昏暗，难辨东西。也有官员奏报，对付英兵，但以长挺俯击其足，应手即倒。这一派胡言，居然也让道光皇帝深信不疑。就连林则徐也认为，中国只要禁止茶叶和大黄出洋，“已能立制诸夷之命”。他还认为，“夷人除枪炮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这些荒唐错误的判断不久就被战争的进程所推翻。鸦片战争的失败，终于使少数先觉者“睁眼看世界”，将目光转向“九州”之外，转向“五大洲”和三大洋。中国从此迈上了走向世界的漫长而艰辛的历程。

1853年马克思写道：“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鸦片战争的失败，终于打破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藩篱，中国人从被迫接触世界逐渐转向主动了解和深入认识世界，这是一个艰辛而又漫长的过程。

古代中国人具有大陆民族的典型特征。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当中，中国人很少充当主动的角色。从汉代到元代，往来于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客商，主要是中亚、西亚和欧洲的波斯人、

阿拉伯人、罗马人等。在朝廷和地方官府眼中，这些客商都是蛮夷之邦向中国表示归顺的“贡使”。这些蛮夷之国在各代官方典籍中名见经传者，大多不出十数个。明代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规定了“十五不征之国”，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这 15 个大明朝不屑征伐的“蕞尔小国”，差不多就是朝廷所知道的所有“外国”了。

隋唐以后，战乱和灾荒逼迫一代又一代沿海地区的中国人迁徙到东南亚。这种移民在近代以前对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影响。明初奉命远航海外的郑和在东南亚一带发现许多世代定居的华人，曾经大为惊讶。这些“域外异闻”不久就随着船队罢驶而销声匿迹。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对海外各国不知、不闻、不问。即使是士大夫阶层，也把海南岛的三亚海湾看作天之涯、海之角，似乎已是天地的尽头，至少是中国风化所及的天地的尽头。

在士大夫的观念中，中国是唯一的礼仪教化之邦，中国之外不可能再有文明。清初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编写的《坤舆图说》，提到古代的“世界七大奇迹”，其中有罗得岛上的太阳神像。清代中叶修撰《四库全书》的饱学之士，竟然怀疑那是南氏来华之后，“得见中国古书”抄袭《神异经》中收录的传说。这可以算是 19 世纪后期风靡一时的“西学源出于中学”说的早期版本。

中国人难于改变关于“天下”的传统观念，是由于很少有人身历和目睹中国之外的广大世界，更是由于中国尚未产生改变这种观念的社会环境和历史需求。18 世纪初期，一位跟随罗马教士游历欧美的中国教徒樊守义，写出他的回忆录《身见录》，叙述了“大西洋人物风土”。这是最早以中文介绍西方文明的欧洲和美洲游记。然而这本书未能刊行，它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 200 年之久，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学者才在罗马国立图书馆发现原稿。

19 世纪初期，一位在海难中被“番舶（欧洲商船）救起、随“番商”周游世界的中国人谢清高，讲述了他“遍历海中诸国”的经历，请人整理成书，名曰《海录》。这本书述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内容大多极其简略。关于欧美国家，叙述稍微详细的是葡萄牙、英吉利和美利坚。书中对于西方的物质文明（如自来水、火轮船）有一些真切的描述。该书刻印之初也曾寂寞一时，可是鸦片战争以后身价倍增，不仅被多次翻刻，而且被收入各类丛书。林则徐称它“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海录》不同于《身见录》的际遇，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观念在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血与火之中开始发生变化。

1849 年，又一本中国人的海外游记在福建刊行，际遇别有一番风光。游记名为《西海纪游草》，本文不足 10 页，而地方督抚要员和名流雅士的题记、序跋和题诗却多达 30 余页，作者林鍼，作为番商的译员“舌耕海外”，涉溟洋九万余里”，抵达花旗（美国）此行被视为空前的壮举，备受称赞。游记记录了航海的景况，记录了美国的民俗和商情，也记录了“火烟轮”（蒸汽机）和“神镜法”（照相术）等近代技术。这些记录无疑使读者大开眼界。有一篇序文，对于国人局促于斗室之中，“几不知天地之大，九州之外更有何物”感叹不已。有一首题诗写道：“足心相对一球地，海面长乘万里风。”这种认识 and 心态，已非传统的观念可以包涵。不过，这本游记此后未见他人引述，大约它的影响不出福建一省。

魏源是属于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他所辑录的《海国图志》，同他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对中国社会甚至对当时的日本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海国图志》中，他一方面收录介绍世界五大洲的著作和舆图，一方面又著文批驳西方的五大洲学说。他根据佛典，论证出亚细亚洲为各洲之冠，而

中国又为亚细亚洲之冠，从而维护了中国乃世界中心的传统意识。另一部较有分量的图书是《瀛环志略》，作者徐纪畬。这本书通过叙述各国的风貌和历史，初步勾画出一幅世界文明分布的形势图，它所介绍的世界知识，无论深度还是真实程度都超过魏源的图书，可是它的影响却不及后者。原因在于，作者“轻信夷书”，“夸张夷人”，没有突出华夏文明的至尊地位。

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随着西方的炮舰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而逐步加深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朝野上下展开了“塞防”与“海防”孰轻孰重的激烈论争。无论是塞防派还是海防派，都有一些明达之士已经看到，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过去那种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相互对峙的局面一去不再复返，一个中国不能不与之打交道的巨大而又陌生的世界，正在一步一步逼上前来。代表这个陌生世界的西方列国，不仅没有崇尚中国文明的虔诚态度，反而板起面孔教训“天朝”，要求对他们放尊重一些，不得再使用“番”、“夷”等轻侮字样。这种要求还被写入条约，清政府必须承担义务。

按照传统观念，对于文明教化之外的“夷狄”，实在没有其他称谓可以使用，如同猪羊不能不称作“牲畜”，桌椅不能不称作“东西”一样。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一位经学大师还坚持认为，西方“夷狄”是“物”不是“人”。可叹的是，他并非在做“口角取胜”的游戏，而是严肃认真、一本正经。不过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中国的官私文书里面，“番”、“夷”等字样确实逐渐减少。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慢慢感到，西方人不仅衣帽和面孔不同于过去记载中或想象中的“夷狄”，而且在他们身后，确乎存在一个异样的文明。

西方人大多是越洋跨海而来，以“洋”字取代“番”、“夷”等

字，似乎是顺理成章而又恰如其分的选择。最初的“洋”字是中性的称谓，不含褒贬。使用这种称谓，表明中国人自我夸张的心态有所减弱，开始用比较平实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中国的近代历程包含两种趋势，一是被逼被迫逐渐向世界开放，一是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在第一种趋势下，西方事物如潮水般涌入，“洋”字的使用愈来愈广泛，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洋枪、洋炮、洋车、洋房，到洋烟、洋火、洋葱、洋白菜，大凡舶来之物，均冠以“洋”字。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消化吸收，还处于初始阶段。在第二种趋势下，洋人的势力一天天膨胀，“洋”字的地位步步高升，以至成为富贵和尊荣的标志，须仰视方可得见。“洋”字甚至与“文明”同义。洋人的戏剧叫做“文明戏”，洋人的手杖叫做“文明棍”，言外之意就是中国的事物已经与文明无缘。这种心态体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无知和愚昧，它是真实世界的扭曲映象。这些已是 20 世纪的事情了。

由于中外悬隔，清政府例禁繁多，19 世纪 60 和 70 年代，能够亲自游历外国者仍如凤毛麟角。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洋人和洋人的世界，只有一星半点模棱和含混的印象。那些捷足先登的远行者带回的外部世界的消息，有时也并不真实可靠。他们的学识、眼光和观念各不相同，这种情况实难避免。第一位派驻英国的中国副使刘锡鸿，对于西方世界就有一些绝妙的议论。他发现英国人事事与中国人相反，论国政“则由民以及君”，论家政“则尊妻以卑夫”，论文字“则自右而之左”，论书卷“则始底而终面”（“凡书自末一页读起”）。经过百般思索，他终于找到了其中原由，“盖其国居于地轴下，所戴者地下之天，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对于地球和天体一知半解的新知识，与唯我独尊的旧观念结合在

一起，也许只能得到这样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当时国内略知“西学”的士绅阶层，大多采用这种杂糅新旧、不辨真伪的思想路数。更多的士大夫，则是“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

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开拓了眼界，纠正和澄清了一些错误、模糊的认识。第一个以官方身分出国游历的满族官员斌椿在遍游欧洲之后，对于古书中所谓“羽民国”、“三面国”等荒唐无稽的记载，发出“传说已久，非身历不能考证”的感叹。1876年奉差赴美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李圭，以前对于“地形如球，环日而动”的学说颇为怀疑，在环行地球一周之后，始信此说不诬。他在《环游地球新录》中写道：“使地形或方，日动而地不动，安能自上海东行，行尽而仍回上海，水陆共八万二千三百五十一里，不向西行半步欤？”以亲身经历验证“西学”，自然颇具说服力。就是那位忠诚护卫道统的驻英副使刘锡鸿，最终也不能不承认，英国人民“以礼自处”，地方“整齐肃穆”，“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19世纪末期，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不能不调整政策，较大规模地派员出国考察，私人出洋的禁例也逐步放宽。知识阶层出国留学或游历，一时成为风尚。甲午战败，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掌握新鲜知识的热情。到戊戌时期，讲求西学、宣传西法的学会和报馆如雨后春笋，遍布南北。九州大地，风气别开。1876年（光绪二年）驻英公使郭嵩焘出版出使日记《使西纪程》，其中称颂欧洲各国仁义兼至、法度严明，认为他们和以前的蛮夷完全不同，也有二千年的文明，提到欧洲人视中国、印度仅为半开化的国家。郭嵩焘的见解引起朝野激愤，举国斥骂，直闹到奉旨毁版。20年后，情势大不相同了，维新士子康有为竟敢上书皇帝，公然指陈泰西列强蔑视中华，“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

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此等文字，居然举国上下，争相传抄、传诵。可见中国人对于世界大局，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另一位维新士子梁启超，更是大声疾呼：大地万国，上下千年，无时不变，无处不变。“变而变者”其国强，“不变而变者”其国亡。在他的宣传鼓动中，描绘出一幅优劣递嬗的世界历史和文化多元的人类文明图。这与传统的天下观念已经很少有共同之处了。

近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从“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成为“中外联属”、“地球合一”之天下，再变为“列国相争”、“优胜劣败”之天下，经历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变化不可谓不大。但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相交的转折点上，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世界强国先进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哲学学说相比较，还有不小的距离，中国要实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想，后面的道路还相当遥远。

熊志勇

“三跪九叩”与“鬼使”

——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大难题

- 坚持不对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进北京时像乞丐，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像小偷；
- 1844 年，道光皇帝为躲避接见美国使臣，居然不惜牺牲主权，同意签订《望厦条约》；
- 1877 年，郭嵩焘成为中国第一位外交使节，却被人称为“鬼使”；骂名穷极九州四海；
- 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大清皇帝终于向西方使节显露“天颜”；
- 1900 年以后，外务部每派公使出国，亲朋故旧推荐随员的条子常常超过千张之多。

从 17 世纪中叶开始，欧洲进入近代外交的新时代。这在当时至少有两个标志：第一，确认了常驻外交使节的地位和作用；第二，规范了各国交往的平等原则。不过，这种原则在实力对比的背景下常常是暗淡无光的。正是在这个时期，亚洲大地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大清朝。大清皇帝“继天承统”，自认为“四海宾服”、“万邦景从”。清朝继承中原王朝的体制，作为“天朝上国”，定期接受藩邦及属国的朝拜和进贡，同时给予册封和赏赐。朝贡和册封的关系是清朝早期对外交往的全部内容。

一百多年以后，西方和东方这两种毫不相干的情势，被欧洲跨洋越海的商船和炮舰连在一起，演化出一幕又一幕历史的悲喜剧。按照清朝的规矩，外国使臣应在所乘车船上悬挂旗帜，写上“某国贡使”字样，表明身分。使臣在觐见皇帝之后应立即离京，不准逗留。最要紧的是，使臣见到皇帝或皇帝的代表时，必须行三跪九叩的跪拜礼。这几样规矩显然不合乎近代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但是关系到“天朝体制”，清王朝决不允许随意改变。然而对于西方列强的使节来说，这几样规矩一样比一样难以接受。中外双方在三跪九叩的礼仪问题上首先爆发了冲突。礼仪之争竟然成为 19 世纪前期和中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头等重要的难题。

中国历来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历朝皇帝都自认为是“天下共主”，所以只有皇帝一人可以享用三跪九叩的大礼。1730 年初，清廷派托时等人去彼得堡祝贺新沙皇即位，实际是为出兵平定新疆准噶尔做外交准备。雍正皇帝特意叮嘱使臣，“我中国使臣无论出使何国，从无叩拜之礼”，不许用三跪九叩之礼觐见俄皇。他要了一点滑头，命托时托词不见沙皇，如果对方一定要见，只能“按拜见王爷之礼拜见贵汗”。俄国人与清王朝早有来往，当然知道中国的礼仪，但是并没有觐见之礼的问题。1731 年 1 月 9 日，托

时到克里姆林宫递交公函后，向新即位的女皇行一跪三叩首之礼。可以想见，清朝君臣的自我感觉是把俄国女皇降格为中国的王爷一级，虽然俄国人并不会同样的感觉，但是雍正皇帝一定心满意足。雍正是一历经磨难才登上皇帝宝座的，为人灵活机变。但是事关国体的时候，他与其他中国皇帝并无二致。他的儿子乾隆皇帝则更进一步。

1793年，英国为了扩大通商，派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指望从此在中国设立常驻的外交使节。在此之前，从16世纪初期以来，西方已经先后有15个使团前往中国，但是他们一律被视作“贡使”。马嘎尔尼个性倔强，而且自恃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代表，他希望作为第一个真正的外交官，迫使中国接受西方文明。为此，他与自负的清朝大臣为觐见皇帝的礼仪大起争执。他坚持行欧洲通行的单屈膝礼。清朝大臣则一定要他行三跪九叩礼。他提出了交换条件：中国官员在英王画像前行叩拜之礼，他就向中国皇帝行同样的叩拜礼。这当然是清朝官员绝对不能同意的。在此之前，荷兰和葡萄牙的使节都曾经为了实际的商业利益，屈从清朝皇帝的要求，马嘎尔尼是第一位坚持要他的君主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外国使臣。乾隆皇帝虽然非常不高兴，毕竟还有盛世君主的气度，体谅英国“僻居荒远”，不识“天朝体制”，特别恩准他免行跪拜之礼。不过乾隆在给英王的“敕谕”中，对扩大通商、派驻使节等要求一律回绝。至于马嘎尔尼在朝见时究竟行的是中国之礼还是英国之礼，已成为历史疑案。参与其事的英国人守口如瓶或语焉不详，而中国官员则啧啧称赞英使“一到殿廷膝齐地，天威能使万心降”。有人认为当时很可能出现了马嘎尔尼不由自主、双膝及地的戏剧性场面，但是从后来马嘎尔尼使团受到的对待看，至少马嘎尔尼本人并没有手忙脚乱，临时改行三跪九叩之礼。同

行的另一位英国人写道：“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这也正是当时中国人的外交观念的真实写照。

清王朝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统治局面的宏大气象一去不返。嘉庆皇帝就没有他父亲那种气量了。1805年，俄国使节因不愿意叩头，到库伦后就被阻止进京。1816年，英国再次派阿美士德来华，他的态度和马嘎尔尼一样顽固，清朝官员曾经想强迫他去拜见嘉庆皇帝，被他坚决拒绝。嘉庆皇帝龙颜大怒，当夜把他们驱逐出京，随后给英王下达的“敕谕”说：“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孝顺，不必岁时来朝。”实际是彻底拒绝和英国建立关系。欧洲国家对于这类外交事件的得失也曾议论纷纷。拿破仑认为，使臣本应入境随俗，不必为礼仪小事贻误大事。拿破仑也认为，叩头毕竟“有悖人性”。但是这位讲求实际的前法国皇帝似乎不能明白，这种礼仪的要旨，就是以违背人性的规定，最大限度地拉开距离，使皇帝高居于亿兆臣民之上。英国人的见解和拿破仑大不相同，他们从此不再派使节来华，而是派来了荷枪实弹的军队，强制中国接受他们的文明，同时肆意掠夺中国的财富。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被迫同英帝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愚妄自大的心理没有改变。1844年，美国派出的使臣顾盛抵达澳门，目的是取得同英国相同的权益。顾盛看透了清廷的虚骄心理，故意坚持要去北京，亲自向皇帝递交国书。道光皇帝惧恨交加，谕令钦差大臣耆英悉心“开导”，绝对不可允准。耆英以顾盛放弃进京为条件，同意签订《望厦条约》，满足了美方要求。顾盛未动用一兵一卒，却满载而归，受到美国政府嘉奖。清廷为维护旧的礼仪和体制，居然不惜牺牲主权。可见自道

光以降，清王朝国势日蹙，危机日深，处理对外关系已经没有自信和力量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在议和谈判中，他只在“不见使节”这一点上讨价还价。圆明园被烧，《北京条约》签订，中国蒙受的损害难以估量，而咸丰最感痛心的，却是未能阻止“夷酋面见朕弟”，即外国使节以平等身分会见恭亲王奕訢。和约签字后，咸丰害怕公使要求“亲递国书”，迟迟不敢回京，最后病死在热河行宫。明清两朝闭关锁国数百年，只在明末清初有过短暂的开放，朝廷上下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虚骄达到极致，难以面对真实的世界。咸丰曾经因为美国总统的国书对他平等相称，大为不悦，竟然在上面批道：“夜郎自大，不觉可笑。”这个讥讽他人却实际讥讽了自己的绝妙批语，成为愚妄的中国统治者可悲的历史笑料。

1860年，欧美列强获准在北京派驻公使，公使在觐见中国皇帝时不用再行跪拜礼，清政府的公文也不再用“夷”“狄”称呼外国。清政府被迫接受了外交关系方面新的事实和新的观念。不过，清政府一直以同治皇帝年幼为名，拒绝各国公使觐见。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清政府陆续派官员赴欧美考察，这些清朝官员会见各国君主和首脑时一律采用西方礼节，握手鞠躬而已。1868年初拿破仑第三接见清使志刚等人，特别声明虽然中国以皇帝年幼为名不见外国使节，但是他愿意亲自接受国书，清使仍然是三鞠躬。这些海外见闻显然有助于清王朝逐渐有所改变。到1873年，同治举行加冠典礼时，各国公使终于争得觐见机会，所行礼节是三进三鞠躬。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大清皇帝终于向西方使节显露“天颜”。这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转折。